

激進、保守與知識分子的責任

● 李良玉

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激進與保守，固然可以用國外經典作家的有關定義來衡量，但是，至今似乎還沒有中國學者根據它們的具體內容，作出相應的定義並進行解說。因此，似乎仍有討論的必要。激進與保守的涵義究竟是甚麼？如何對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進行鑒定？依我看，至少有三個問題必須考慮進去。

中國近代任何時期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無一不是圍繞這個時期的具體歷史課題設計了自己的答案。

兩種「主義」的背景和脈絡

第一個問題，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都是相對於某種社會秩序和社會問題而發生和變化的：某種社會秩序和社會問題發生了變化，激進與保守的內容和形式也必然隨之變化。

1919年，胡適說：「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都漸漸的變成了困難的問題。」在這裏，胡適並沒有

涉及激進與保守的論旨，但卻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中國近代任何時期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無一不是圍繞這個時期的具體歷史課題設計了自己的答案。這一課題完成了，時代又提出了下一個課題。近代社會的變是有底的，又是沒有底的。因此，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爭論，是有完的，又是沒有完的。中國一百多年來歷史，同樣是兩者的爭執沒完沒了的歷史。

第二個問題，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都是根據某一時期人們對某種社會秩序和社會問題的具體態度來區分的。在某一時期內，人們對某種社會秩序和社會問題，必然會有多種態度。

1919年，張東蓀說：「我們有一個最苦痛的地方，就是中國今天的現象是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人聚於一堂。」（《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一卷一號。）近代中國的變動，不僅烈度太劇，而且速度太快。人們對一種新鮮尚未品出味道，另一種新奇又湧了進來。中

一概而論的謬誤

國近代可怕的不是激進與保守的對峙，而是最激進的與最保守的對峙。

第三個問題，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都在政治意義上和文化意義上同時存在，因此，它們都有文化的與政治的兩種形態。

中國近代社會的變，受到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支配，這一點，恐怕不會有甚麼爭議。近代中國的保守主義，常常不是不肯變，而是不肯按西方近代文化的方式去變。反過來說，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也常常不是不肯尊重傳統文化，而是把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看成實現近代化、現代化的障礙。這樣就造成了另一種歷史現象，保守主義打着維護綱常名教的旗號反對政治變革，激進主義從攻擊傳統入手推動政治變革。縱觀中國近代思想史，這種現象屢見不鮮。

然而，我們如果換一個視角，又會看到上述結論只在有限的範圍內才能成立。因為中國近代的保守主義或激進主義者，並非清一色地都是政治家。許多保守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終身都是學者。同時，還有一些保守主義或激進主義的理論，始終只以文化的形態作用於社會。保守主義也好，激進主義也好，只有當它變為實際的社會政治運動，或者與政治權力高度結合的時候，才對社會表現出非凡的支配力量。例如，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和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基本上並未實現以政治的形態干預社會，近代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權從來都是專制而並不開明。因此，這類保守主義的理論，雖然是一種政治設計，但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實踐，始終停留在觀念文化的範疇之內，那麼，是否也可以看成文化保守主義呢？

根據以上對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涵義的認識，我以為：第一，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界，不可一概而論。近代中國每個時期，都有一個中心任務需要完成。圍繞着為何完成這一任務，各種社會勢力分屬於不同的政治陣營。例如清末時期的章太炎，文化觀念上有國粹主義內容，但並不妨礙他成為威名大震的激進革命宣傳家。再例如清末時期的梁啟超，對傳統文化持激進的批評態度，但恰恰是當時與革命派相對峙的政治保守主義營壘中的骨幹人物。第二，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內容不可一概而論。例如，有些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往往有激進的文化追求，有些激進主義反而包含保守主義的文化內容。比方說，「五四」以後的胡適，一般被視為政治保守主義者，但他在文化觀念上毫不妥協，主張對舊有學術思想不盲從和調和。再譬如說，十年「文革」時期，民族虛無主義的「破四舊立四新」、平均主義的「大寨記工」、恐怖主義的「全面專政」，與深深扎根於中國歷史傳統的紅太陽普照神州現象，並不根本排斥。如果說十年「文革」有甚麼主義的話，那就是封建的、法西斯的烏托邦主義。它充分證明，激進主義可以從保守主義獲得足夠的營養。第三，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作用不可一概而論。比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自然可以歸入文化保守主義的範疇。但是，馮桂芬把中國的「聖人之道」與西方的「長技」區別為「本」和「術」，本質上反對了保守派把西方長技說成「奇技淫巧」，掩護了引進西方技術，

中國近代可怕的不是激進與保守的對峙，而是最激進的與最保守的對峙。保守主義也好，激進主義也好，只有當它變為實際的社會政治運動，或者與政治權力高度結合的時候，才對社會表現出非凡的支配力量。

如果說十年「文革」有甚麼主義的話，那就是封建的、法西斯的烏托邦主義。它充分證明，激進主義可以從保守主義獲得足夠的營養。

觀念上具有革新的意義。而戊戌以後所強調的體用關係，則咬定了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不可變，因而具有反動的性質。

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余英時先生和姜義華先生都提出了主動自覺地平衡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問題。就中國近代思想史而言，這一問題確實沒有解決好。不過，假如不是這樣，中國近代史也就不成其為中國近代史了。近代中國的問題太多了，舊的問題尚未解決，新的問題又出現，一切都在變動不居的過程之中。

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必把中國近代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對峙，看得過於可怕。它們遠非任何情況下都成生死對頭。只有當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完全以政治形態出現，也就是說，變成了實際的政治運動或者與政治權力高度結合的時候，它才有可能喪失起碼的容忍精神，如同姜義華先生所說，「終於導致一次又一次流血政變、武裝鎮壓、暴力革命及內戰」。

姜義華先生提出了新型知識階層應當擔負防止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極端化的任務。這是一個非常精闢的見解，我基本贊成。不過，我們對這一點的理解，不應當在下述兩個問題上發生誤會。

第一個問題，不應當把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看成是和近代新型知識階層完全無關的東西。換句話說，在許多場合，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恰恰都是新型知識階層的專利品。「五四」以來的反傳統主義者、學衡派等等，有幾個不是學貫中西的

人物？被目為政治保守主義的80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的旗號下面，不正是一批嘴邊掛滿新鮮名詞招搖過市的風頭人物？

第二個問題，不應當把對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節制，看作必須對思想文化進行人為的任意干預。近代中國的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者，誰不認為自己找到了真正救時的良藥？誰不宣稱自己的主張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論保守主義還是激進主義，只要是以文化的形態在活動，本質上都是一種知識的和思想的活動。對這種活動，似乎沒有必要憂心忡忡地提防甚麼。需要的倒是堅持真理的勇氣、平等的自由的討論。如果我們一面認定了某種東西，一面又要時刻警告自己免趨極端，又如何能夠堅持真理？

在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之間，形成互相制衡、互為補正的良性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近代社會限於歷史條件無法實現。但是不管怎麼說，近代知識分子有一點不能推辭，即最大限度地表現自己的容忍。無論激進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獲得了優勢，都給對方以必要的尊重和諒解，真正做到心腸寬厚，胸懷寬廣，態度寬容，氣氛寬鬆，政策寬大。近代知識分子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留下了許多令人遺憾的問題。現在，余英時先生和姜義華先生提倡養成一種文化上的雅量，對此，我舉起雙手，表示十二萬分的擁護。

1992年5月5日於南京

李良玉 任教於南京大學歷史系，著有《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等書及有關中國近代史論文多篇。

不應當把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看成是和近代新型知識階層完全無關的。被目為政治保守主義的80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的旗號下面，不正是一批嘴邊掛滿新鮮名詞招搖過市的風頭人物？

需要的是堅持真理的勇氣、平等的自由的討論。如果我們一面認定了某種東西，一面又要時刻警告自己免趨極端，又如何能夠堅持真理？